

【档案介绍】

清初抄本《明太仓诸生谱》及其文献价值

郭文安

南京图书馆所藏《明太仓诸生谱》(以下简称《诸生谱》)为清初抄本,作者是明人沈承。沈承(?—1625),字君烈,号即山,南直隶太仓人,生员。据《诸生谱》序文所言,该书成于天启四年(1624年),然所载内容迄于南明弘光元年(1645年)。故而可以推断,天启四年之后内容为清初之人增补而成。但增补之人未留下任何信息。

《诸生谱》记载了嘉靖十六年(1537年)至弘光元年,南直隶太仓州历次岁、科考优劣等案及入学、贡生、科举中式等一应生员名录,内容翔实,为进一步了解生员群体、深化基层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。《诸生谱》成书后并未付梓,流传不广,鲜为世人知晓,明清以来的藏书目录未见《诸生谱》之记载。近年来,随着明代基层社会研究的不断深入,地方文献得到了空前关注。生员群体作为基层社会的重要力量,备受瞩目。然而,因诸多缘由,以生员为记录主体的文献十分罕见^①,相关研究难以推进。因此,本文对《诸生谱》的内容及其文献价值予以介绍,期冀引起学界重视。

一 《诸生谱》的内容概况

《诸生谱》仅1卷,内容由三个部分组成。

第一部分为沈承所作序文。全文为:“好异者谓天上有金榜、有银榜、有铁榜,果尔,不知秀才当得何榜,定是泥榜耳。泥中淘得出金银铁也,然砂砾苓通亦莫贱于泥也。嗟乎!百年间来甲乙具在,请屈指银汉,几人白首,几人青云,即复做到布衣之极,二三千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烟,与泥何异哉?只金痴酸子,波波向水火里钻去,掇册纵观,能无冰消灰冷。人有言:一日看除目,三年损道心。若对此悲叹,退发深省,学佛学仙,思过半矣。然则金银铁又似不如泥也,故为作《诸生谱》。虽无太史公论赞,不可不呼为青衫《史记》,家置一本案头也。”^②

这段序文亦收录于沈承文集中^③。沈承用“泥榜”指称生员榜,即将秀才比喻为“泥”,并与进士、举人、贡生等较高级功名对应的金、银、铁作比较。事实上,秀才是进士、举人、贡生的来源,即沈承所谓“泥中淘得出金银铁也”,可却是最贱,地位最低。即便如此,“泥”虽贱,“布衣之极”者富贵功名终将化为云烟,与之无异。但在某种程度上而言,沈承认为学佛学仙的金银铁榜之士,尚不如泥榜之诸生。显然,沈承慨叹于生员不受世人敬重,以致无人记述,殊为憾事,遂作《诸生谱》以为青衫《史记》,使列位生员得以流传后世。

第二部分为《凡例》。记录了生员在岁、科考发案以及遗才、散遗才之赏罚帮补细则,较《明史·选举志》所载更加详尽,具体如表1(见下页):

由表1可知,《明史·选举志》所记六等黜陟法仅按照成绩区分对生员的处置,较为简略。而《诸生谱·凡例》则在生员不同成绩的基础上,根据其名色与获廪、增时长予以区别对待,具体措施详密且较为合理。当然,表中六等黜陟法通常是在提学官主持的岁考和科考中出现。岁考以考核

生员学业为目的，通过奖惩以施激励。科考（按：不同于科举考试）最初仅作为乡试资格选拔考试，无补廪、黜罚等奖惩措施。然明后期岁考废弛，提学官多以科考行岁考之事。因此，科考“充补廪、增，给赏（按：原作充补廪、增给赏，误），悉如岁试”^①。相较岁考，科考一、二等生员除了获赏晋升外，还可参加最近之乡试。故科考实际兼具岁、科二试的大部分职能。此外，科考后还有遗才、散遗才（大收），皆为乡试资格试类别，目的同为选拔士子参加乡试。《诸生谱·凡例》对其帮补起复规则亦有详细记载，可补《明史·选举志》之阙。

表1 《明史》《明太仓诸生谱》载岁科考发案细则

《明史·选举志》	《明太仓诸生谱·凡例》
一等前列者，视廪膳生有缺，依次充补，其次补增广生。一、二等皆给赏。	一等文理平通生员，凡增、附、青、社俱补廪，无廪缺，附、青、社先补增，无增缺，青、社先复附，仍各候廪。原廪、增停降者，俱准收复，照序补廪。
三等如常。	二等文理亦通生员，惟增补廪，附、青、社俱补增，无增缺，青、社先复附，原停廪降增者，俱准复廪，廪、增降附者，止准复增候补，不准补廪。
四等挞责。	三等文理略通生员，凡赏罚俱无。原停廪者，照新例准收复候廪，其丁忧起复、病痊考复、缘事辩复及原增降附者，亦准复，照旧间补。青衣、发社者，准复附，廪已降增者，不准复廪。
五等则廪、增递降一等，附生降为青衣。	四等文理有疵生员，廪姑免责，照例停廪，不作缺，限六个月送考定夺。原系停降者不准限考，姑照旧，青衣、发社者不准复，仍同增、附，各朴责。
六等黜革。	五等文理荒谬生员，廪停作缺，原停廪降增、增降附、附降青、青发社，原降增、降附者，照增、附递降，俱候岁考定夺，原发社者，竟径黜为民。
	六等文理不通生员，廪膳十年以上发社，近六年以上与增广十年以上，发本处充吏，不愿者听，余俱黜退为民。内补廪、游学未及六年者，姑发社作养，其患病、给假等，及起复在考期前者，俱照限补考。
	遗才不准帮补。除正遗才，青社竟复附，其散遗才姑免复考，亦准复附，其未取诸卷，姑免行案。

第三部分即《诸生谱》的主体内容。记录了嘉靖十六年至弘光元年间太仓州37次科考、18次岁考、1次岁考兼科考等第案，以及历任提学官、入学童生、文武科举中式者、贡生、卫学生员、骑射等一应名录，甚至还包括岁、科考与生员入学试题。其中，岁、科考发案名录一等皆载，二等间收，或与三至六等相同，仅列生员数量而无详细名录。为了对《诸生谱》内容有更直观的认识，兹以天启三年提学御史孙之益岁考案为例，制成表2（见下页）。

由表2可知，岁、科考案一般都首列提学官的简略信息，继而详细记录一等生员姓名和补廪的人数。考试试题与二等成绩生员时记时阙，并不固定。三等至六等成绩者人数众多，故只列数量而无姓名。嘉靖三十一年以后之新入学员，不论众寡，姓名均辑录在册。“府学”条目所列为太仓州被选入苏州府学肄业的童生，即新进府学生员。“岁贡”下辑录的是当年按例出贡之人。当然，在科考案下，一般附有“乡试中式”，甚至是“会试中式”条目，载录是科乡试、会试中式之人姓名。总之，《诸生谱》所载大部内容在其他明代史籍中颇难寻获，是研究明代生员及其相关问题的一手资料。

表 2 天启三年太仓州岁考案

天启三年癸亥孙宗师岁案，名之益，号六吉，四川邛州人，丁未进士。
一等 28 名，补廩 4 人。题：子游为武；全章君子之道四，二句。 陈赤、曹圣士、王洽、钱时用、董铉、吴升元、王虞孙、袁𬭎、张采、沈翼新、沈鉴虚、沈承、张允恭、顾懋康、何南春、浦光岳、赵宏基、周惺存、金对扬、赵维新、周昂、徐一灏、吴淇、黄炜、浦光宿、龚圣漠、吕良弼、张嵘。
二等 42 名，三等 317 名，四等 42 名，五等 32 名，六等 33 名，俱未录。
入学 64 名。题：已冠，有宋存焉，泽水者是也；未冠，至于犬马，恶用是彘，肉也。 王祖勋、叶时龙、朱衣、郭士髦、王庆祚（己卯）、陈万祥、郁藻、孙玉成、沈应龙、张蕴、黄德荣、王铨、许骥、沈曜、张志德、吴大纯、浦寓、王式、江德祐、高九霄、高攀龙、王嶽、顾廷坚、徐宗达、浦麟、顾大信、王良、周御蕃、顾汝弼、杨克清、陈玉陛、钱神、赵之玄、陈燮、赵学基、任鼎爵、张偕行、马凌霄、张浚、曹邦宁、袁临、王瑞宇、徐三智、钱培、杨廷荪、江度、沈凤、徐宛、张性、沈游、陈杞、陆敬之、王约、吴士瑜、郁文凤、郁玄明、李世懋、顾定宇、王孚嘉、周鉴、吴世荫、王家彩、孙瑛、陆培。
府学 12 名。 王国藩、黄经圣、文选、沈玉衡、费为辅、王慎、王瑀、徐汝聘、顾而铭、黄恺、吴绍虞、姚明漠。
岁贡 2 名。张大统、唐舜扬。

说明：生员姓名后附干支纪年，表示其科举中式年份。如表中王庆祚后附“己卯”，其乡试中举正是崇祯十二年己卯科。沈承病逝于天启五年，因此，此附文显然为清初之人增补。

二 《诸生谱》的文献价值

《诸生谱》以生员群体为载录对象，内容包罗甚广，是研究明代地方教育史、地方社会史的珍贵史料。其文献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：

一、有助于丰富明代生员社会流动的研究

明代生员的上行流动以通过科举获取功名、继而出仕任官为正途，然顺利达成者毕竟寥若晨星。相关研究可利用科举名录、地方志、家谱等文献予以阐发。但是，游离于乡试考场之外的大部分生员，其社会流动研究却因史料阙失而难以展开。事实上，除了科举以外，生员通过提学官考核（岁、科考）获优，继而补廩充贡，亦不失为一条重要的上行流动途径，《诸生谱》为考察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素材。

欲了解生员出贡的上行流动轨迹，关键之一是掌握该过程所需时间。以往研究者只能从时人描述或少数明人年谱的记载予以估算，数据获取十分有限且零散不成体系。地方志虽记载生员出贡具体年代，但生员入学时间却成空白，难窥全豹。《诸生谱》详载嘉靖十六年后太仓州历代生员入学和出贡的时间，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较为完整和详细的史料。兹举数例以作参考：同在嘉靖二十五年入学的王业、徐大宾，岁贡时间分别是万历四年（1576 年）、六年，各历经 30 年、32 年方得出贡；而万历九年应贡的刘大纶、顾坦，入学分别是在嘉靖二十九年、三十四年，各经历了 31 年、27 年肄业时间。其他生员应岁贡亦多在入学 20 年以后。可见，生员获取岁贡出学，经历数十年之期已然为常，无怪乎明末清初人叶梦珠感叹：“（前朝学校）廩生非二十年之外，无望岁贡，甚或有三十四（按：当为三四十）年，头童齿豁而始得贡者。”^⑤生员通过出贡获取上行流动之难，于此不难想象。

生员入学时间的载录，是《诸生谱》区别于其它文献而尤为珍稀之处。结合生员出贡的实际人数及其所耗时间，大致可以勾勒出嘉靖中期至明末太仓州生员从入学至出贡的轨迹，较为清晰地勾

画出地方生员通过出贡获取上行流动之基本面貌。可见，《诸生谱》为了解明后期太仓州生员的社会流动提供了更加细致的史料，对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二、有助于深化岁考、科考以及拓宽乡试录取率之研究

生员肄业期间最重要的两种考试为岁考和科考，一系黜陟赏罚，一系功名进取。二者皆生员命运攸关所在。遗憾的是，相较于科举考试，明代文献甚少记载岁、科二试详情，考试录取人员及其数量更是难以知晓。以致学者对这两种考试的研究多局限于考试内容、方式、作用等方面，对其发案与执行情况大多含糊其辞，或一言带过，或避而不谈，相关研究仍停留在概念性阐述。《诸生谱》的记载，可使岁、科二试的研究更趋具体化和形象化。

岁考是提学官遍历各地，考校生员学业优劣以定黜陟赏罚之试，而科考则为提学官选送士子参加乡试的资格考试。两者皆发轫于正统朝。对于提学官而言，通过岁考可以了解地方士子学业之大概，亦可赏优罚劣以示激励；对于生员而言，岁考意味着一次检验学习成果，同时也是获得奖励的重要机会。当然，竞取优等成绩多为好学上进之士的目标，反之亦有怠学废业之徒畏惧岁考而企图避考。这表明，岁考的考核效果在生员群体中已然显现。如此效果的取得，除了制度的完善外，同样重要的还有对考过生员的措置方式及其执行情况，也就是岁考发案机制的实际运作。《诸生谱》所记载内容，为充分了解岁考发案提供了颇为全面、细致的史料。可对明代岁考发案情况作深入探讨。

《诸生谱》所载岁考发案情况，太仓州额设廪膳生、增广生各 30 人，其余为无定额的附学生、青衣、发社等。岁考发案六等成绩中，通常一、二等被视为优等或高等，皆给赏、晋级或候补，而四等朴责、五等降级或黜革，六等发社、充吏或黜革，多称为劣等。综合统计，太仓州优等生员数量在隆庆二年（1568 年）为 47 人，此后缓慢增长，崇祯十年（1637 年）达到最高，为 80 人，与隆庆二年相比增长了 70%。而以六等数据完整的 9 次岁案计算，优等生员的比例未与之并进，甚至有所下降：万历十四年 17.4%、二十一年 16.6%、二十六年 14.2%、三十四年 15.5%、三十六年 16.4%、四十四年 13.3%，天启三年 14.1%，崇祯八年 15%、十年 14.1%。显然，这主要受生员总数增加所累。由此不难发现，隆庆至崇祯朝，太仓州优等生员的比例维持在 13% 至 18% 之间，相对比较稳定，并没有与生员总数的快速增长势头保持一致。不仅如此，由于一等生员补完后方至二等递补，而一等生员有二三十人，占六等案人数比例维持在 5% 到 7% 之间，廪缺有限，致使二等生员几乎没有机会补廪，《诸生谱》中未见二等生员补廪即为最佳证明。与此同时，劣等成绩的比例有所下降：万历十四年 37.3%、二十一年 19.3%、二十六年 17.4%、三十四年 9.9%、三十六年 15.2%、四十四年 20.1%，天启三年 21.7%，崇祯八年 22.9%、十年 15.4%。劣等成绩生员总数亦较为稳定，除了万历二十一年至三十六年的 4 次外，其余基本维持在百名左右。由此可见，《诸生谱》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明中后期太仓地区岁考发案及其执行情况，是深化岁考研究的重要档案，史料价值颇高。

除岁考外，科考发案在《诸生谱》中亦占据重要位置。科考目的是为乡试选拔士子，故三年一考成为惯例。《明史·选举志》载：“（科考）一、二等为科举生员，俾应乡试……三等不得应乡试。”^⑥按例，科考成绩列入一、二等者称为科举生员，可以参加乡试，三等者即便第一名亦不得赴试^⑦。事实上，在部分年份，三等前列者亦可赴试，如天启四年，三等第一至五名皆准科举；崇祯九年亦允许三等前二名的生员参加乡试。可见，虽然多数情况下科考严格遵守一、二等生员应试之例，但三等生员赴考并非孤例，《明史·选举志》所言“三等者不得应乡试”并不准确。同岁考一样，结合考试发案细则，可以对科考的运行有更直观的认识。概而言之，《诸生谱》为岁、科二试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史料依据。

《诸生谱》除了记录每次科考录取人数外，乡试中式者亦备载详明。因此，利用赴考人数与中举人数作比较，可以得出太仓州历次乡试录取率之变化。以往明代乡试录取率多以省为单位进行计算，难以拓展至州县一级，原因无非是文献记载的阙失。《诸生谱》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直接的史料依据。以嘉靖二十八年至四十三年的六科乡试为例，太仓州准入乡闱士子数量分别为 67、64、64、66、64、64，录取人数是 2、3、3、7、0、1，录取率依次为 2.99%、4.69%、4.69%、10.61%、0、1.56%。这六次考试赴考人数较为稳定，但中举人数出现了较大波动，录取率亦随之起伏。总之，结合《诸生谱》对太仓州历次乡试录取率予以统计和总结，可为拓宽乡试录取率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。

三 余论

传世文献对明代进士、举人、贡生之记载可谓汗牛充栋。相对而言，生员成千累万，地位较低，多为世人忽略。即便是地方志、儒学志等反映地方学政之史料亦极少载录生员具体信息，致使后世学者无法窥其全豹。随着明代地方社会研究的不断深入，反映基层不同群体的档案史料愈来愈受到研究者重视。而相对于浩如烟海的清代档案，明代档案文献存世较少，关于学校生员的文献更是稀见。生员作为地方士绅之主体，是考察明代地方社会的重要对象。清初抄本《诸生谱》作为“青衫《史记》”，为进一步了解明代生员群体的社会流动、岁考、科考以及乡试录取率等重要问题提供了珍贵文本，是颇具价值的重要档案，值得进一步挖掘和利用。

然而，《诸生谱》也存在一些缺陷。如嘉靖十六年以前的内容失载；岁、科考试止载一等生员名录，其余等级生员大多只列数量而无详细名录，甚至付诸阙如；生员因患病、丁忧、缘事等缺席考试的人员名录和人数完全没有反映出来。因此，在利用《诸生谱》研究地方生员相关问题之时，需要参照其它历史文献，互相补充、考证。

注释：

- ①检索各主要藏书机构及相关书目，类似文献仅有常熟市图书馆所藏《常熟明代乡、会试录科目录附科举、岁考优劣等案》，所载内容自嘉靖三十四年至弘光元年，起始时间稍晚于《明太仓诸生谱》。《常熟明代乡、会试录科目录附科举、岁考优劣等案》与《诸生谱》均为清初抄本，长期以来未见学者引用、研究。
- ②南京图书馆藏（明）沈承等：《明太仓诸生谱》，清初抄本，原书无页码。
- ③（明）沈承撰，毛孺初辑评：《毛孺初先生评选即山集》卷 1《题诸生谱》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，北京出版社 1997 年影印版，第 41 册，第 581 页。
- ④⑤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 69《选举志》，中华书局 1974 年版，第 1687、1687 页。
- ⑥叶梦珠：《阅世编》卷 2《学校 3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，第 29 页。
- ⑦学人多以《明史·选举志》所载为准，如陈宝良《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，第 254 页）；吴恩荣《科考、遗才与大收：明代乡试资格考试述论》（《安徽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13 年第 5 期，第 102 页）。而以《诸生谱》来看，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准确。

（作者郭文安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邮编 510006）

（责任编辑 哈恩忠）